

## 尋求更適切的分析進路

曾凡慈

這篇論文對我來說，實在是一個料想不到的轉彎。最早的緣起，在於我對當代台灣社會兒童觀與育兒價值的好奇。然而，初步瀏覽文獻的過程中，不斷跳出強調早期童年發展如何影響孩子一生成就的諄諄話語（在我看來無非是以科學之名行規訓母職之實的話術），隨即又發現，這並不只是一套被動的知識倉儲，召喚母親們回應成為馴化主體；國家原來早已建立一套監管系統，以提供遲緩兒童早期療育為名，主動對早期童年發展進度施以密集的制度性檢查。

我以為這是一個重大的制度變革，有能力重寫人們對早期童年、乃至於對兒童本身的認知，也是國家權力媒合社會團體更進一步向私領域與親密關係的滲入，因此它絕不只是一個針對特殊兒童的保護措施，而是一個普遍性的、廣納全體兒童人口的治理方案（當然它對特殊群體確有強化檢查的傾向）。但有意思的是，當我大驚小怪地詢問周遭親友對這件事的看法，多數年輕父母或者不曾察覺這個系統正在作用，或者略知一二但視其為理所當然。我發現這個監管權力原來具有保護色，無論是在醫療機構操作、或是在幼教／托園所施行，都是那麼貼近原本場域的世界觀與例行事務，因此能夠安靜而順理成章地遂行發展凝視，國家權力的代理人在日常實作中甚至無須為此多做正當化。而在初步探索發展遲緩的相關界定之後更讓我困惑，它是一個相當複雜且充滿不確定性的身心狀況，並非明確可徵的疾病或障礙，顯然大半檢查人也非專業者，為什麼監管網絡還是可以集結起來並且某種程度上是有效地運作？

於是我開始有興趣，想要弄清楚這個新的監管系統，包括它的現在以及來龍去脈。然而，一開始有目的地收集資料後卻驚覺陷入迷霧，台灣的早療體制竟然如此複雜，在政府單位不但橫跨三個不同部門（常被批評為多頭馬車）、在地方上也經常是各縣市各行其是（或被美名為百花齊放），在實作上更是力求整合多方專業，各專業又是人言言殊，總有不同的界定與做法，光是辨識出在這段簡短的歷史中哪些社會團體具有重要性，澄清其論述與立場、資源與限制，並確認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勾繪出早療系統在多方力量折衝拉鋸下踉蹌推進的過程，就是一個耗時費力但卻饒富樂趣的解謎過程。

然而，當自認有了初步的理解與所需的素材，如何選擇適當的分析方式來結構這些蕪雜的生料、賦予社會學意義，卻成為最大的難

題。為此，我不斷尋找各種理論觀點，試著用它們來闡釋這個過程，每次找到一個觀點就改寫一個版本，卻總覺得說不明白這個故事，甚至也說不足它的重要性與意義。從最早的醫療化理論關注醫療專業權威擴張，到社會類屬分析關注文化變遷，乃至於強調科技物對網絡連結的貢獻，都讓我在寫作過程中焦慮自己無法充分說明在當權者的意志與人類行動與認知之間，那種多重性的連結如何建立與如何起作用。直到某天嘉苓秀出一本Jasanoff的著作，大力讚嘆她所提出的co-production 具有驚人的綜攝能力，有助於促進科技研究與社會學基本議題的對話，我拜讀之後發現「這正是我要的！」並著手改寫新的版本，終於才確立了我認為較適切的研究路徑，能夠涵蓋這個議題真正涉及的範圍，並解明它所蘊藏的最終提問——關於當代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

帶著論文到研討會、工作坊中發表，都像是參加魔鬼訓練營一樣刺激。但我總覺得所有願意讀你生澀作品，並無私給予意見的人都是天使，包括後來的論文審查人以及編委會，都讓我有機會察查自己在分析上的各種盲點。而確實將探照燈略為移位就能看見不同的世界，最深刻的感受是必須注意到自己心中對研究對象的評價，以及這樣的評價如何影響資料收集與詮釋的方向。或許是因為最初是從治理權力的概念出發，我一直預設這個監管體系與監管凝視是「成功」的，並以為只要有疑似遲緩兒童的通報量為證據就足夠。因此我所寫出的第四個版本斷言監管裝配「遂行無間斷的發展凝視」，完全沒意識到自己犯了推論過當的錯誤。這個盲點先後歷經多位老師提點，我才真正覺察到是自己身為研究者的見獵心喜，而非國家的大能創造出一個全控的機器，然後生產出目前這個故事，希望更對稱地觀照到現實世界的異質性、背叛、脫稿演出與各種非預期結果。

我也經常被問到「立場」的問題。關於治理權力的本質，我只能試圖說明而無法給予評價。在最近對母親的訪談中，我也曾動念想提供篩檢表給某位憂心孩子發展狀況的報導人，或有時忍不住參與進孩子幾歲應該有什麼樣發展的意見交換網絡。而當面對一些「請問妳對現在的做法有什麼改進建議」的詢問時，我也會一面回答應該降低篩檢工具的偽陽性、確認本土發展遲緩盛行率以設立合理工作目標云云，一面也焦慮自己是不是變成監管裝配的「共犯」？生產性權力是否可比擬壓迫性權力的惡？當意識到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學術知識愈來愈成為現代社會治理方案與技術的構成要素，我還在尋求更適切的研究位置。